

人口、技术与产业变迁的治理难题与出路

张志鹏

(南京工程学院商学院,江苏 南京,211167)

摘要:人口下降、技术替代和产业转移带来了全球治理、产业治理与社会治理的三重难题。经典理论从经济或利益因素、文化因素、制度政策因素的视角对人口、技术和产业长周期变化做出了解释。在制造业全球化背景下,面对人口—技术—产业的互动演变,选择不同的治理方式将会导致不同的治理后果。为了实现善治,本文构建了促进就业的治理新路径。这个治理路径的创新之处在于:国家可以通过开展社区服务来解决就业难题,提升当地的收入水平;通过服务支持社区中的另一部分人参与到制造业的特定环节以及农业生产中,进而参与全球制造价值链和国际贸易体系。要实现这一治理路径,应鼓励多元主体提供社区服务、完善支持社区服务的制度建设、在全社会传播新的职业观念。

关键词:人口下降;人工智能;产业变迁;社会治理;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D669.3

一、问题的提出

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全球化进程突破“冷战”的阻隔持续深化。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国际层面经贸合作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人口下降、技术替代和产业转移的新变化,出现了逆全球化、失业增多和老龄化等问题,在全球治理、产业治理与社会治理上面临新挑战。面对多层次治理问题,各国采取了出台生育和产业支持政策、发展银发经济、改变贸易政策等举措加以应对,但未能形成整体合力,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具体而言,当前治理难题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下列三方面。一是人口总量减少、技术替代与产业转移的挑战同步出现。《2024 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指出,截至 2024 年中期,全球人口达到近 82 亿,预计在未来 60 年内还将增加 20 亿。与此同时,全球总体出生率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展现出“创造性破坏”的效果,不仅在生产线上机器开始替代工人,而且自动驾驶也正在取代人工驾驶。一大批制造业曾经如同潮水一般涌入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在又开始退潮,涌向新的产业承载地。上述人口、技术和产业的新变化在发达国家和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同步出现。

二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治理问题相互关联。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不仅导致了养老金不足等养老难题,也降低了社会的活力与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则在一定时期增加了就业压力。随着产业向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国家间的贸易争端也日益增多。因此,当三重变迁同时发生时,一个国家就会面临养老、就业等社会治理问题,产业流失、贸易萎缩等经济治理问题,以及国际矛盾增多的全球治理问题。

三是国内与国际治理问题相互交织。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国内的社会治理问题与产业转移、国际经贸关系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紧密相关。《中国统计年鉴 2024》显示,2023 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48‰ 。《2023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披露,截至 2023 年底,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21.1%,我国老龄化呈现出数量多、速度快、差异大、任务重的形势和特点。与此同时,产业竞争加快了产业转移速度,国际贸易争端增大了“逆全球化”的风险。

上述三个特征表明,当今的治理问题是一个长周期、系统性的问题,既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经济社会转变,也是国家内部转型发展的阶段性转变。因此,要系统解决三重挑战导致的多层次治理问题,就需要建构起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阐明人

收稿日期:2024-10-23;修回日期:2024-12-04

基金项目: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智库”

作者简介:张志鹏,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社区治理与社区经济。

E-mail: 1145732483@qq.com

引文格式:张志鹏.人口、技术与产业变迁的治理难题与出路[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4):31-37.

口、技术与产业三者变迁的内在机制。

事实上,对于人口变迁、技术创新和产业转移,社会科学研究者已经从单一学科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概括而言,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经济或利益因素、文化价值观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加以解释。

(一) 经济或利益因素

在经济学视角下,人口、技术和产业的转变都是选择的结果,而影响选择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或利益因素。首先,在解释人口数量变化上,加里·贝克尔将孩子视为双亲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生育孩子与否以及生产数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比较成本。如果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获取的预期总收益一样多,那么,就会出现提高质量、减少数量,用质量代替数量的行为。“收入的增加与较高的质量收益率相结合,就可以大大地降低生育率。”^[1]这一理论表明,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生育率通常会下降。其次,在解释技术进步上,约瑟夫·熊彼特提出“创新”就是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个经济过程^{[2]73-74}。对于产业转移现象,新经济地理学(NEG)在分析产业集聚和区位中心形成时强调规模经济、运输成本以及市场规模、产业关联等因素的作用^[3]。由此可见,出生率下降、技术创新、产业转移这些现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追求利益的必然选择。只要一个国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就必然会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

(二) 文化价值观因素

在社会学及人类学的视角下,文化价值观是影响人们行为的关键因素。在人口变迁上,研究者对欧洲调查发现,那些经历了生育率下降的地区有快速传播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共同特点。具有相似文化(如相同的语言、共同的种族背景、相似的生活方式等)的地区比那些文化相似性少的地区更有可能经历生育率下降。战后,与生育率下降相联系的最好例子是中国文化^[4]。在技术创新上,熊彼特已经发现创新需要“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需要企业家精神^{[2]102}。创新社会理论认为创新也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各种文化、制度、惯例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创新的成功率和绩效。社会资本理论和创新环境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创新的社会组织问题^[5]。在产业转移上,文化同样被看作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文化样式将对贸易样式起决定性的影响”“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6]近年来,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观日益成为国家供应链的重要影响因素。综上所述,文化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技术创新和产业转移方

向,成为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 制度和政策因素

在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的视角下,制度和政策因素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人口变迁上,直接人口政策和间接影响生育率的婚姻政策都对其有显著影响^[7]。1972—2008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累计少生了4.58亿人^[8]。同样,制度对于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产权制度能够形成一种预期,激励人们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利用权利。知识产权制度就具有促进创新效率的功能^[9]。产业转移也会受到制度特别是产业政策的影响,战略性贸易政策就强调实现利润转移或追求规模经济效应,获得技术外溢效应^[10]。产业政策作为政策工具和治理手段,在大国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1]。显然,制度和政策因素对一些长周期变迁也有显著影响,是政府采取的可变因素。

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解析了人口变迁、技术创新和产业转移的内在原因与机制,发现了经济或利益、文化价值观、制度和政策三个层面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将一个国家作为整体来看时,在数十年的周期中,制度和政策显然是一个推动经济利益转变的显著因素,而文化价值观则一直在缓慢地起作用。因此,面对相互关联与混合作用所导致的多层次治理问题,需要在宏观层面提取发生显著转变的制度和政策因素、长期作用的文化价值观因素,在微观层面上关注经济或利益的作用。从时代背景来看,人口变迁、技术创新和产业转移都直接而显著地受制造业全球化的影响,进而在上述三个层面发生变化,并最终汇聚成三重危机的状况。

二、全球化背景下人口—技术—产业互动演变的可能结果

在一个国家的实际运行中,人口、技术与产业会受到同一些因素的影响,三者之间也存着密切的关联。解析在外部因素影响下三者的关联互动,是进行治理创新的前提条件。如果忽视了三重因素的互动,试图单方面解决社会治理、产业治理或全球治理问题,往往会受限于其他因素而无法实现。基于经典的经济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多学科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人口、技术和产业三个长周期的变迁在宏观上受到共同的制度条件和文化的影响,在微观上则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具有同频共振的特征。综合前述的经典理论研究,本文提出了人口—技术—产业互动演变的理论模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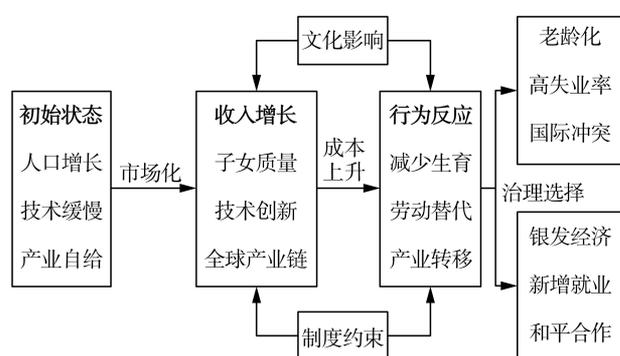


图1 人口—技术—产业互动演变的理论模型

具体而言,人口、技术和产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形成相互适应的状态。在一个非市场的封闭国家中,通常会存在人口稳定增长、技术缓慢进步与产业自给的初始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收入低下,家庭依靠孩子“数量”来获得收益,人口数量稳定增长;缺乏市场的激励,技术创新也很少出现;产业以农业为主,制造业也是以自给自足为主。一旦在制度上采取市场经济体制,加入制造业全球化进程,初始状况就会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随着收入增长,人们更加注重子女的质量而非数量,加之生育政策的约束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口增长开始放缓。巨大的人口基数压低了劳动力成本,成为吸引外资的关键,推动面向全球资源和市场的产业链得以建立。同时,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在收益的激励下,在产权制度和鼓励创新文化的影响下,技术创新开始快速增多。由此,收入增长、就业充分与企业繁荣、全球化深化形成了良性循环。

然而,经济运行规律内在决定了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工资收入的增长,在一定阶段会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劳动力成本与土地成本等持续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三方面后果:其一是推动生育率快速下降,减少未来适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养老保险的压力;其二是推动人工智能等生产和服务技术的发展,用于替代劳动力,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其三是成本增加也推动大量产业转移到其他低成本生产国。这些后果又进一步相互联动,产生了更为复杂的治理难题。例如,当产业持续转移出去后,又会加剧国内的就业压力,使得出现“出生率不足”与“失业率上升”的两难境况。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在增加了社会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技术创新的动力。无法及时采取新技术又会降低国际竞争优势,迫使企业采取低价竞争而出现“内卷”局面。

面对人口—技术—产业的互动演变,不同的治理方式选择将会导致两种可能的后果。一种后果可以称之为低价竞争与冲突循环。这一治理方式

的后果是,人口老龄化与高失业率加剧了社会治理问题,限制了技术创新和产业竞争的长久优势;低价销售则会激化贸易争端甚至引发国际冲突。另一种后果则是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循环。这一治理方式的后果是,通过发展银发经济、新增就业机会、降低生活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从而参与全球产业链合作,实现和平合作。从人类历史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治理不当的产物。“大萧条”造成各国大量失业、学生辍学和治安恶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一些政府对内助长了极权主义政治运动(如德国纳粹),以发展军事工业来解决就业问题;对外则提高了贸易壁垒寻求自保。然而,这些治理思路虽然在短期内增加了就业,减少了贸易逆差,但却推动贸易摩擦逐步转化成军事对抗,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全球化再一次兴起的今天,类似的挑战又横亘在各国面前。

对于如何避免前一治理后果,实现后一治理后果,研究者给出了多方面的政策建议,有些建议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应用。例如,在生育支持政策方面,有的学者提出用个人所得税法支持家庭生育^[12];有的学者认为保持收入稳定性、采取弹性工作时间、提供托育服务和多样化公共服务等措施能缓解生育压力^[13];有的学者提出,通过营造尊重生育的温馨社会环境,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男性和女性共同分担生育成本^[14]。在老龄化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延迟退休有助于提升产出,有利于养老金改革和积极老龄化政策制定^[15]。有的学者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16];有的学者提出通过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来实现积极老龄化^[17];有的学者提出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应对老龄化挑战^[18]。在解决就业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实现“专业—产业—职业—就业”的四业贯通是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突破性路径^[19];有的学者提出积极优化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的政策设计^[20];有的学者认为应避免和减少“去技能化”效应对青年劳动者及人力资源供给的消极影响^[21]。在产业转移方面,有的学者提出应加快形成以国内循环推动国际循环的发展格局,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基于内需尽快形成链接全球、由中国主导的价值链体系^[22]。有的学者认为应构建“以我为主”的弹性安全供应链^[23]。

上述的对策建议分别针对不同问题提出了治理思路,然而在忽略了多层次治理难题相互关联的事实后,单方面就事论事的治理策略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以落地。例如,延迟退休虽然缓解了养老金问题,却加剧了青年人就业的困境;发展数字

经济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劳动力的替代;就业不足问题如果不解决,基于内需的价值链体系也就难以建立起来。因此,我们必须在系统分析人口、技术和产业变迁机制和后果的基础上进行整体思考以解决治理难题。

三、促进就业的治理新路径

深入来看,当前的复杂治理难题隐含了一个时代命题: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社会是否可能形成自发秩序?也就是说,市场机制能不能同时实现国内人口数量、就业水平、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及投资的稳定运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人类历史还没有给出成功的案例,但是却给出了“此路不通”的惨痛教训。不通的道路就是对内发展军事工业解决就业问题,对外通过贸易报复和战争对抗来解决资源和市场问题。因此,必须另辟蹊径来探索一条和平与发展为主导的治理道路。

那么,如何同时解决全球治理、产业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复杂问题呢?这就要分析找出多层问题的关键症结是什么。不难发现,无论是贸易争端、产业向外转移,还是国内的消费不足,其导致的共同难题都是失业率上升。因此,解决问题的症结应从增加就业开始。然而,解决就业难题的选择所剩无几,发展军事工业是一条不归路,建设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只会增加无效供给。一些新兴的网络直播、网约车、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的就业岗位也已接近饱和。

破解就业问题需要从需求的视角来加以思考。目前大部分城市居民在消费需求上依然处于“低价格—低质量—缺服务”的状况。具体而言,在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上人们已经得到充足的供给。和产品相比,大部分家庭真正缺乏的是价格合理质量合格的服务,包括物业服务、家政服务(包括养老护理、幼儿托养、月嫂服务、育儿服务、整理收纳、形象管理等)、家庭教育服务、心理咨询服务、法律服务、金融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社工个案服务、旅游服务、科研服务等。从宏观上来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通常近80%,而据《202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仅为47.1%。事实上,日本走出“迷失的30年”,服务业发挥了带动销售和就业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发展服务业是解决就业难题的合理出路。

那么,增加服务业就业人口该从何处着手呢?服务业的特征是线下提供、本地化服务、劳动密集

型,需要就近提供。这就意味着社区或者小区、社群将成为服务就业的重要载体。在社区开展服务,既有利于满足居民需求,也有利于居民就近实现就业,实现微观上的内循环。服务离不开本地的专业人士,因此,服务价格具有地域性特点,服务的质量在各城市、社区存在差异。事实上,在全球各地制造品价格基本相同的情况下,高质量服务业成为拉大各地收入水平差距的关键。近年来,一些城市也认识到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重要性,建立“15分钟生活圈”,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不过,这些社区生活圈主要提供的还是粮油蔬菜、老年食堂等必需品,对于高质量专业性的服务供给还比较缺乏。

由于资金能够低成本的在世界各地流动,制造业总是在寻求成本洼地。只有那些高端制造业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选择留在较高成本的地点。由此,不同质量层级的制造业将会在全球形成多条平行的产业链。同一个产业链中的不同环节也会依据劳动力的成本和质量而选择留在不同国家。作为全球分布的制造业,其产品价格在世界各地相差无几。

结合上述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两个特征,我们可以构建促进就业治理的新路径(见图2)。这个治理路径的创新之处在于:国家可以通过开展社区服务来解决就业难题,提升当地的收入水平;通过服务支持社区中的另一部分人参与某一层级的制造业特定环节以及农业生产,进而参与全球制造价值链和国际贸易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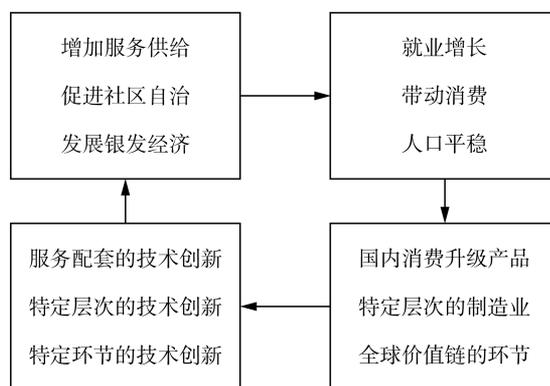


图2 促进就业治理新路径

(一) 发展社区服务

近年来,在政策上多次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振消费”“增加内需”,也采取了家电“以旧换新”等举措。这些政策和举措更多地关注产品的消费和需求,忽视了服务的消费与需求,强调了宏观层面阻碍物品流通的地区壁垒,却忽视了在微观社区层面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障碍。在传统模式中,我国狭义的社区服务主要是当地政府或居

(村)委会为社区成员提供公共服务和其他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服务,侧重民生保障、社会福利与救助等。这样以单一主体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社区服务同样无法带动消费和就业。因此,本文提出广义的社区服务模式,是指由多元市场主体提供的现代服务产业,主要由家庭购买,也可以由政府、居(村)委会或基金会购买。这种广义的社区服务模式已经在多个城市得到实践,包括成都市的“社区商业”模式、上海的社区服务超级综合体、杭州的“邻里中心图书馆”。笔者在基于对南京市多个社区需求、服务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应致力于促进多样化社区服务进入家庭。多样化的社区服务在解决家庭问题的同时,还可以带动居民对物品的消费。例如,一位退休老人如果能够得到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可以由此带动高品质的生活消费品、营养品、智能化养老设备、适老化设备等产品的消费。

发展社区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具体做法。一是增加高品质服务供给。针对中高收入家庭在高品质服务上的需求,开发或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深入来看,高品质服务的短缺受制于信息不够透明和信任关系不足。因此,增加高品质服务的供给需要在社区、小区或社群中进行,通过社会组织等专业机构的参与和资源链接,确定服务的质量标准,建立起居民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信任;在此过程中,还需要对提供服务的求职者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提升他们的服务意识和技能。二是促进社区居民自治。居民自治一方面有助于增加俱乐部物品的供给,另一方面有助于倒逼服务质量提升。当居民能够建立自治组织,开展协商议事,社区就可以增加共享养老、托养服务、共装电梯等服务。无论是购物团、业主委员会还是社区居委会,都有助于提升俱乐部产品的服务品质。三是发展银发经济。建立老年协会,开展老年互助,建立老年大学等方式,一方面可以协助一些退休人士参与社区服务,另一方面也能提升高龄人士的生活品质。

(二) 带动就业、消费与生育

随着智能化机器的广泛应用,制造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减少。而多样化的社区服务业能够容纳更多就业人口,带动消费,促进生育率提升。具体而言,一是社区服务能够增加就业。社区服务可以让一些求职困难者以及退休老人,通过培训实现全职或灵活的就业。二是社区服务能够带动消费升级。服务通常会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设备和产品、材料等,而社区高质量服务的普遍开展能够带动更多产品,特别是高质量产品的消费。三是社区服务有助于降低养育成本,实现人口稳定。社区服务可以提供质量较高,价格合理的生育、养育、教

育等服务,帮助更多家庭解除后顾之忧。同时,部分宝妈通过社区服务又可以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和成就感。当家庭实现了生育成本下降和收入机会增多之后,生育率就会得到稳定甚至开始回升。

(三) 参与全球制造

仅依赖社区服务业无法构成经济的良性循环,服务业必须与制造业、农业相结合,通过制造业和国际贸易来获取全球收益,从而形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结合。而参与全球化之后的制造业已经与世界市场链接在一起,这时候就需要作出选择,如何在同时面对国内需求和国际需求时形成本国的制造业竞争优势。概括而言,一是定位于国内消费升级需求。真正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同时也需要在国内有稳定的广泛需求。与此前低质量、低价格的模式不同,与稳定的生育率、消费升级、高品质服务业相适应的是更高品质、价格合理的制造业产品。二是构建特定层次国内产业链。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几乎所有产业需要具有完整的产业链,但并不需要在某一个产业中占据所有层次的产业链。例如,汽车产业可能需要放弃高端或低端产业链,而专注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相适应的中档次汽车产业链。这一层次的产业链既能够满足国内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又可以在与其他国家中档次市场的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特别是一些具有传统特色和优势的产业,通过提升基础研究,完全可以进入国际高端市场。三是参与国际价值链特定环节。一些本国并不占据优势的产业,则可以选择在某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环节参与全球产业链,面向全球市场获得收益。在参与全球制造的过程中,社区服务为制造业的生产和研发人员提供支持,解除后顾之忧;制造业在提升本国居民消费品质的同时也保持了全球竞争优势,避免依赖国际市场,从根本上化解了贸易争端和冲突风险。

(四) 选择技术创新领域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产业链则是牵引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载体。在确定了参与全球制造的消费层级、产业层次、产业环节后,企业就需要选择技术创新领域,实现技术进步与就业水平的良好适应。具体而言,一是在与服务业配套的领域进行技术创新。随着高品质社区服务的广泛开展,相关配套产品的技术研发需要跟上。例如,日本在养老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养老设备、医药、化学产业的研发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有效支持了养老服务的智能化、专业化。二是聚焦特定层次产业链进行技术创新。并非只有高端制造业才需要技术创新,即使是中端、低端制造业也可以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形成

竞争优势。针对特定产业层次的技术创新需通过深入调查消费者需求,在材料、工艺、流程、管理等方面持续提升产品质量。三是全球价值链特定环节进行技术创新。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更需要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才能够保持产业地位。

虽然技术创新会在制造业以及农业中持续地替代劳动力,但是技术创新也会在社区服务中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随着技术创新的积累,更高质量的产品伴随着高品质服务进入居民家庭,推动了消费升级。

四、对策建议

全球化的快速扩张积累了巨额财富,也积累了大量矛盾。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被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铁锈州”随之出现,公平贸易、反全球化和“脱钩”的呼声持续不断。与此同时,新兴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左右夹攻的局面,一方面,在大量产品出口全世界的同时国内居民消费不振;另一方面,曾经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因产业转移到其他低收入国家而消失。生育率下降和技术替代导致了失业率上升。显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改变。

本文提出的治理路径,其本质在于实现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和谐并存,在获得全球价值链分工收益的同时提升社区居民福祉。这是由于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居民能够获得低成本的制造产品,发展中国家工人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随着收入的增加,社区居民可以获得高品质的服务,社区服务的发展又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在这样一个治理路径下,发达国家可以协助更多产业工人转型到服务业。因为即使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高额关税挡在门外,依然无法堵住更多低收入国家的低价产品进入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发展社区服务拉动居民消费需求,合理确定参与全球产业的定位。在此,有必要对新兴发展中国家在主体培育、制度创新和文化发展方面提出建议。

首先,鼓励多元主体提供社区服务。不仅要支持社区居(村)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社区社会组织,而且要鼓励更多传统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转型进入服务业。

其次,完善支持社区服务的制度建设。除了采取保护企业家人身权利及企业权益、降低税费、降低企业成本等常规政策外,还需要针对社区服务业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如人社部门支持服务职

业技能的培训;民政部门支持低收入家庭的就业培训;街道、乡镇鼓励社区(村)开展服务业等。妇联、残联、侨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也可以链接资源,促进不同群体参与到社区服务业中。

再次,在全社会传播新的文化观念。一是传播新的职业观,改变传统对服务业的偏见,让更多人认识到现代服务业不仅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也是受人尊重的重要职业。二是传播新的教育观。当精英教育已经转变为大众教育时,教育不再是身份的象征,而是掌握专业技能的一种方式。国家需要开放职业教育培训,同时改革现有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培养更多具有感同心心的服务者。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沟通能力更为重要。三是传播家庭观和生育观。针对家庭结构的转变,应用多元文化资源,通过讨论组建家庭、生育和养育子女的意义和价值,让更多人能够从物质利益和文化收益多重角度作出生育选择。

参考文献:

- [1]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 家庭论[M]. 王献生,王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184.
- [2]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何畏,易家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 [3]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 483-499.
- [4] Coale A J.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reconsidered [C]// *Lieg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 1973: 395-397.
- [5] 蒂莫·丁·海迈莱伊宁,里斯托·海斯卡拉. 社会创新、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产业、区域和社会的结构调整过程探索[M]. 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 编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 [6]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刘维, 张立平,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141.
- [7] 张越, 陈丹. 新中国 70 年的人口政策变迁与当代人口发展 [J]. *宏观经济管理*, 2020(5): 62-69.
- [8] 陶涛, 杨凡. 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J]. *人口研究*, 2011, 35(1): 103-112.
- [9] 道格拉斯·诺斯, 罗伯特·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 [M]. 厉以平, 蔡磊,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
- [10] Brander J, Spencer B. Rationals for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 [M]//Krugman P.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USA: MIT Press, 1986.
- [11] Rodrik D. Industrial poli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 *CEPR Discussion Papers*, 2004.
- [12] 冯铁拴. 个人所得税法支持家庭生育的理论逻辑与体系重构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3): 64-75.
- [13] 吴帆, 陈玲. 当代中国年轻人低生育意愿背后的文化机制及其政策意涵 [J]. *公共行政评论*, 2022, 15(5): 49-65, 197.
- [14] 茅倬彦. 三孩政策下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基于多重家庭均衡理论的思考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7(3): 64-73.

- [15] 邱牧远,王天宇,梁润. 延迟退休、人力资本投资与养老金财政平衡[J]. 经济研究,2020,55(9):122-137.
- [16] 胡湛,彭希哲,吴玉韶.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J]. 中国社会科学,2022(9):46-66,205.
- [17] 谢立黎,韦煜堃.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价值、实践与挑战——兼论高校积极应对的新路径[J]. 贵州社会科学,2022(8):95-102.
- [18] 金牛,原新. 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基础、战略导向与路径选择[J]. 河北学刊,2024,44(2):158-166.
- [19] 谭泓. “专业—产业—职业—就业”的四业贯通——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路径突破[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3,37(3):54-62.
- [20] 胡拥军,关乐宁. 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替代效应探究[J]. 改革,2022(4):42-54.
- [21] 方长春. 去技能化与再技能化:新就业形态与青年职业发展[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16):16-25.
- [22] 刘志彪. 中美全球价值链的重组:从生产消费再平衡到产业转移[J]. 江苏社会科学,2023(6):63-71,242.
- [23] 洪群联. 全球供应链调整变化与我国应对策略研究[J]. 全球化,2021(1):52-62,135.

Governance Dilemmas and Ways Out of Demographic,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Change

ZHANG Zhipeng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 China)

Abstract: The decline in population, technological substit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er have collectively engendered a triple challenge within the realm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dustri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governance. Classical theories have elucidated the long-cycle changes in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ic or interest factors, cultural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policy factors. In the context of manufacturing globalization, the interaction and evolution among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present a myriad of governance options that may culminate in two potential outcomes. To attain effective governance outcom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ovel integrated governance framework to promote employment. The innovation of this governance approach resides in its capacity for each country to tackle employment challenges through community services, simultaneously elevating local income levels. Additionally, it promotes the involvement of another segment of the community in specific facets of manufacturing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ir incorporation into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 To realize this governance pathway effectively requires encouraging diverse stakeholders to provide community services,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that support these services and promoting innovative occupational concepts throughout society.

Key words: population declin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ial change;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service